

蒋一苇

我的经济改革观



蒋一苇

我的经济改革观

经济管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9 号

责任编辑:刘科 孟昭宇

技术设计:贾晓建

我的经济改革观

蒋一苇 著

出版: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红园胡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外文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23.25 印张 583 千字
1993 年 6 月 第 1 版 199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025-754-1/F·617

定价: 20.00 元

企业本位论

一. 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其中的“改革”就是指我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我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有许多部分不能适应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这一事实为人们所公认。但是，体制问题的症结何在？是否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政面彻底改革？改革应当从何入手？对于这些，认识还不完全一致。

我国现行的一套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从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当时虽然有效地恢复了国民经济，但是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重工业几乎是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采取苏联经济体制

作者小传

蒋一苇(1920.2~1993.1),福建省福州市人。抗日战争时期当过航空机械士,后在广西大学数理系肄业。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参加地下活动,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先后主编《科学与生活》月刊、《彷徨》杂志等刊物。194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编辑、《挺进报》特支宣传委员,1948年4月,《挺进报》遭破坏后,幸免于难,转移至香港,在生活书店(后合并到三联书店)负责科学图书编辑工作。

1949年3月到北京工作,主编《科学技术通讯》、《机械工人》等刊物。1950年任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兼主编。1952~1959年在第一机械工业部任《机械工业》编辑室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并兼任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1959年,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对待,并下放到郑州第二砂轮厂劳动和从事企业管理工作。1964年以后,在石家庄电机制造学校、河北省机电学院担任企业管理教学工作。

1978年得到平反昭雪,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

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任副所长、所长、并兼任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中国经济年鉴》总编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副校长。

1985年,卸任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后,任重庆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改革》杂志主编、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修中心基金会会长兼研修中心管委会主任、深圳无线电工贸公司企业委员会主任。

1988年,被选为全国七届人大代表、七届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主要论著有“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和“经济民主论”等。

代序 我的改革思想

我的改革思想大致分三部分，但出发点和基础还是企业本位论。研究体制改革的有很多学派，但我觉得从经济本身的组织结构上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不多，我的研究是侧重在组织结构上。“体制”中的“体”就是组织，“制”就是运行方式。“体”没有摆正，仅讲运行机制是不行的。搞商品经济、讲价值规律，但没有商人、没有卖者和买者，就没有载体，就运行不起来。

1979~1980年，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根据自己长期以来对企业的一些看法，结合商品经济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都在1980年发表的《企业本位论》中涉及到了。

1981年我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这当中就涉及了职工主体论。我认为在企业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职工是否占主体地位。如果本企业职工觉得企业的权 and 利与自己无关，就将会大大损害社会主义的特色。

微观基础是企业，企业内部的基础是职工。一个是讲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一个是讲企业与职工的关系。按照我的观点，整个国家

• 1992年11月4日到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蒋一苇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理论讨论会，蒋一苇同志因病重未能到会，但他为大会提供了录音。本文是根据他的录音整理的。

社会运行的机制是以企业为本位,是靠下面的主动,而不是靠上面指挥,企业不是客体而是主体,这是民主化的一个特点。企业内部职工是主体也是民主化的特点。

归结起来,从整个经济体系看,政府仍然有着经济的职能,但这应当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才能够有社会主义的特色。

所以说,整个社会主义特色是民主经济或者说经济民主,因此我的观点总的是经济民主,其中的基础是企业本位论,而企业内部则是以职工为主体,这三者就构成了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观点,请大家共同商讨。

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两个队伍结合,一支是能够联系实际的理论队伍,另一支是能够并且善于联系理论的实践队伍,特别是领导队伍。理论工作者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但是更难能可贵的是实际工作者能够联系理论,也就是通过实践去理解、运用理论,并关心理论的作用和发展。

蒋一苇

1992年11月3日于中日友好医院

目 录

总 论

要勇于跨出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1)
向“吃大锅饭”挑战	(5)
上海试点企业调查	(7)
鼓励竞争,保护竞争	(16)
充分发挥竞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21)
一个急待明确的大政策	
——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对待“资本”问题	(29)
从首都钢铁公司看体制改革	(37)
首钢在改革中阔步前进	(46)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有限资本问题	(54)
经济体制的组织模式问题	(63)
全面深化改革,要建立一套民主的、	
科学的决策程序	(95)
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99)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关系,	
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色	(114)

企 业 管 理

关于“鞍钢宪法”的几个认识问题	(121)
再论正确地学习和推广全面质量管理的经验	

——答新浩同志的“商榷”	(127)
全员培训是企业现代化的战略任务	(131)
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基本特征	(136)
关于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几个认识问题	(153)
企业的全面整顿是建设性的整顿	(170)
关于提高企业素质的若干理论问题	(227)
关于提高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素质的十项建议	(237)

企 业 本 位 论

企业本位论	(249)
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274)
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种新形式的探索	
——试论劳动共有股份制	(289)
再论搞活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296)
论股份制	(302)
关于“企业集体股”的争论	(323)
关于深化企业改革问题的探讨	(331)
完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三十条建议	(352)

职 工 主 体 论

所有职工都实行合同制不符合	
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	(361)
关于劳动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366)
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确立职工	
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	(375)
职工主体论	
——论工人阶级在建设时期的历史任务	(385)
评我国现行企业劳动制度	(406)

两 级 按 劳 分 配

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	(417)
试论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	(423)
小集体的内部分配问题	(430)
关于按劳分配与工资制度问题	(435)
试论净产值分配	(461)

企 业 领 导 制 度

论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体制	(471)
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领导制度	(481)
在企业中实行党政分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 客观要求	(497)
社会主义企业领导制度的进一步探索	(501)

企 业 联 合

坚持自愿互利原则,促进企业联合	(509)
企业自由联合的一种有效形式 ——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在自愿基础上 搞好联合的调查报告	(515)
正确处理公司与工厂的关系 ——关于常州拖拉机公司的调查	(524)
正确处理公司问题是当前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533)
企业集团与股份制	(541)

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

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试点的几点建议	(557)
从重庆几个联合体的实践经验看如何发挥	

• I •

中心城市的作用	(565)
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与经济体制改革	(575)
从重庆市综合改革看中心城市的作用	(593)

经济民主论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的 经济民主	(601)
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与行业协会	(612)
经济民主论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	(621)
企业文化与经济民主	(645)

宏观管理

谈计划与控制	(651)
关于走出困境的研究方法和组织的建议	(660)
论国有资产的价值化管理	(667)
再论国有资产价值化管理	(678)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具体结合	(684)

对外开放

过渡地区论 ——试论香港的未来地位与深圳特区的 发展战略	(691)
把汕头市建成潮汕侨乡经济特区	(700)
对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几点看法	(719)
关于建立中国南部沿海经济合作区的设想	(728)
后 记	(734)

总 论

要勇于跨出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必须改革，这是肯定无疑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已肯定了这一点，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当前一项根本方针提出来，而且预期在今明两年进行小改、小革，同时作好调查研究，制定全面改革的方案。全国人民对中央的这个部署是衷心拥护的，热忱地期待着改革的早日实现。现在，三年调整的第一年，大半年已经过去了，改革的步伐究竟迈出了多少步，这是全国人民十分关注的事情。

经济体制改革是件大事，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大问题，应

• 本文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于1979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兴应革，一定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因此，决心要坚定，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为了稳妥，必须先从小改、小革做起；即使是小改、小革，也要先在个别或少数的地方、企业进行试点，不断总结经验，然后全面推广。坚持这样的方针和步骤，我们就能做到改而不乱，尽可能少出偏差。但是，如果稳妥到连试点都不敢试，第一步都迈不出去，那还有什么改革可言？

现在我们看到两种情况：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从四川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从今年初，就开始在一百个工业企业、四十个商业企业里试行扩大企业自主权，都已经收到成效。新华社八月三十日发自成都的消息，对此作了生动的报道。只举一例来说吧：他们规定试点企业完成规定的经济技术指标，可从计划利润中留成（最多百分之五），还可以从超额利润中留成百分之二十。用这种给经济利益的办法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一试就灵。喊了多年经济核算，一直很难核算起来，如今，企业里似乎人人成了“算帐派”，有了经济头脑。今年头七个月，八十四个试点的地方企业中，有五十五个获得了超额利润。

有人总是担心给企业利润留成稍多一点，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四川的经验说明什么呢？据了解，今年头七个月，全省企业上缴利润和去年同期比并无增长，而一百个试点企业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一。由此可以看到勇于实践的可喜成果。

可是，许多地方的情况并不象四川那样。今年三月，国家经委召开了一个企业改革的试点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市选八个企业试点。当时被选上的企业都兴高采烈，决心在体制改革中当先驱。可是，时间已经不算短，这些企业扩大自主权问题却没有真正迈开步子。卡壳卡在哪里呢？一曰：这几个企业都有一个产品方向与生产规模的问题，企业提出了改革的建议，谁来拍板？因为无人作主，以致悬而未决。二曰“利润留成”，这是企业最关心的问题。财政部门按“规定”进行测算，算来算去，企

业可能得到的奖励基金，竟比去年的实际水平还要降低。企业领导感到这样试点，无法向职工群众交代，纷纷表示不再参加试点。此外，还有许多问题，企业提出了一些尝试性的办法，也难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目前体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的“婆婆”多。改革涉及各个方面，没有一个对各项改革措施都能“拍板”决定的统一领导，企业想进行一点改革是困难的。

为了稳妥才进行试点。既是试验，当然希望其成功，也应允许其失败。好的可以推广，不好的可以改正。这才叫试验。如果前怕狼，后怕虎，不允许突破现行的章法，那还搞什么改革呢？八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八个试行，恰恰是万分之一，即俗话常说的“万一”。万一试出点偏差，既使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后果，也只是万分之一范围内的后果。如果在万分之一的“点”内什么也不能动、不敢动，那又叫什么改革试点呢？

上面这一正一反的情况告诉我们，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勇于跨出第一步。这第一步，就是要允许在规定的“点”里大胆地“试”。这是当前有必要大声疾呼的问题。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场革命。既然要改革，就必然要突破一些传统的观念和习惯的做法，首先遇到某些人的思想阻力。随着改革的深入，还会触及某些人的权力和既得利益，阻力可能更大。目前仅仅是小改、小革的试点，如果连这一小步都跨不出去，今后全面的改又从何谈起？

改革一定要慎重，要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经过试验，不断完善，逐步推行。但是一个新事物的诞生和成长，事先考虑得再周到，也不可能万无一失。而且，旧的矛盾解决了，又可能出现新的矛盾，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不看主流，不辨方向，只是在枝枝节节里顾虑重重，出点毛病又大惊小怪，或者本来不赞成，一旦出了毛病，就当秋后算帐派，用这种态度对待改革，任

何改革也是断然搞不成的。

我们希望各部门、各地方都能象四川省那样，坚决贯彻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珍惜时间，采取积极果断的步骤，勇于跨出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这是形势的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热切的希望。

向“吃大锅饭”挑战

为了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打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必须下决心改变“吃大锅饭”的状况，引导职工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北京内燃机总厂试行厂内经济核算制，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一个很好的尝试。

什么是“吃大锅饭”？“吃大锅饭”就是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责任，不讲经济利益，干多干少一个样。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不赞成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这种反映小生产方式的落后的腐败的经济关系。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列宁总结了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的严重教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建立了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托拉斯和企业，但不会用精打细算的商人的方法充分地保证我们的利益，那我们便是道道地地的大傻瓜”；“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会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

想一想前些年的情况吧，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由于我们缺乏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吃大锅饭”竟然被作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共产主义因素”加以推崇，而实行经济核算和按劳分配则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来批判。这个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带有根本性的是非的颠倒，确是如列宁所说使“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在我们的许多企业里，为什么原材料、动力的消耗高得惊人？为什么不少高级精密的设

• 本文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于1979年8月7日《北京日报》。